

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

胡华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K 827/30

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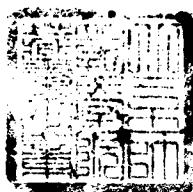
胡 华 主 编

D501/23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44860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744860

封面设计：佟 三
封面题字：王济民
责任编辑：宋嘉沛

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

胡华主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8.25 印张 175 千字

197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册 定价 0.64 元

前　　言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我们出版了这本论文集。这本集子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参加写作的。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有些同志参与了讨论，给了协助。

在六十年前的五四时期，涌现了一批历史人物。本书介绍了十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和活动。当年，他们中多数是青年；有四位是中年，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这四个人在那时也是和青年站在一起，并对青年有着深刻的影响。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思想和革命性质发生剧烈变动的新旧交替的充满了历史事变和革命斗争的伟大时期；五四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从此，中国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磅礴于全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两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经过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的斗争，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从本书所介绍的五四时期的十一位各不相同的青年和中年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经历中，我们可以窥见那个时期的历史面貌，新文化运动前驱者的思想面貌，窥见他们所走的不同道路，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发展锻炼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杰出的领导人。五四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新文化运动提倡者“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在一九二七年从容就义，成为英勇的烈士，永为后世所景仰；陈独秀却最终堕落成了托陈取消派，背叛了革命，他在五四时期和创党初期的思想光芒和声名，成了历史的陈迹。五四时期的鲁迅，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一九二七年以后，他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反“围剿”中屹然挺立，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给我们民族、给青年留下了异常丰富的思想和文化的珍贵遗产。在五四运动的锻炼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恽代英、邓中夏、方志敏，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杰出的群众领袖、英勇的革命烈士，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远是青年的光辉典范。瞿秋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对文化斗争，也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他却犯有严重的错误，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蔡元培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五四时期站在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一边；但他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却一度投靠过蒋介石；而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又重新站在人民抗日运动一边。五四时期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阵营。但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他就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右翼的面目，使文化统一战线分化。以后，他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文化买办思想，抵制革命。最后，成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帮凶文人。

时代在前进，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类社会有它发展的必然规律。时势造英雄，只有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勤勤恳恳地为人民

群众服务，为人民事业英勇地牺牲奋斗的人，才是历史上的英雄。任何高踞于人民之上，甚至与人民为敌的人，势必成为落伍者，受到人民的唾弃、历史的谴责。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温故而知新，我们当代的青年，就是要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接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举的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本书虽然是一本学术性的论文集，但文字还是浅鲜的，青年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历史的知识和思想的启发。由于本书是由十几位同志分头写作的，体例和笔法均保持各自的特色。同时，由于本书所列各个历史人物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人物著述较多，我们就侧重论述其思想；有的人物则活动较多而著述较少，我们就介绍其活动，从中论述其思想。限于我们的水平，这本论文集我们虽然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肃认真地来写作，但错误缺点仍是难免的。请同志们多加批评指正。

胡 华

一九七九年三月

目 次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戴鹿鸣	1
五四时期的李大钊.....	李义彬	41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	肖效钦	54
五四前后的周恩来.....	胡 华 王建初	75
五四时期的鲁迅.....	彭 明	88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	胡 华 彭 明	101
五四时期的恽代英.....	冯 拾	111
五四时期的邓中夏.....	何 沁	121
五四时期的方志敏.....	李安葆	146
五四时期的瞿秋白.....	刘 炼 李安葆	167
五四时期的蔡元培.....	王 淇 王家勋	184
五四时期的胡适.....	陈铁健	218
从五四运动看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彭 明	243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戴 鹿 鸣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早期的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最早从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沉寂黑暗的旧中国，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培育了一代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崭新的道路。李大钊同志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和奠基人，他的光辉业绩是永垂不朽的。

早期的急进民主主义思想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个历史转变时期。在这期间，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的思想界也发生了深刻而急剧的变化。以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发动了“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向统治和禁锢中国人民二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为中国革命从失败和彷徨中走向新的轨道，作了最初的启蒙工作和思想上的

准备。

李大钊积极地参加了这场影响深远的反封建斗争，并且以他特有的鲜明性、坚定性和深刻性，表现了他早期的急进民主主义者的理想和品格，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主将之一。

要求民主和自由，反对封建专制，是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封建王朝，在形式上建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共和国，但实际上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袁世凯在窃取了政权之后，就逐步撕去了他“拥护共和”的伪装，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攻，最后终于把“民国”仅有的一点形式也完全抛弃，公开恢复帝制，把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梦想毁灭了。这个沉痛的打击深刻地教育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因此，他们首先冲破了专制复古思潮的牢笼，大声疾呼地要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李大钊就是一个要求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英勇战士。

李大钊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决心研究政治，于一九〇七年考入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勤奋地学习欧美各国资本阶级革命的历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以及近代的自然科学等。“随着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想亦日益腾高”。^①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对革命表现了极大的热

^① 见李大钊《狱中自述》，一九二七年四月。

情，寄与了无限的希望。但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现实却使他大失所望。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就看出了袁世凯军阀统治的专制实质，“民国”只是徒具形式的“假共和”，人民并没有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他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①这是对袁世凯专制统治最早的也是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公开化之后，李大钊更是奋力奔走呼号，联络同志，共谋反抗。李大钊于一九一三年冬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为了联系反袁斗争，他于一九一六年春一度返回上海活动。不久，他又回到了日本，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编辑《民彝》杂志，从事反对帝制复辟的宣传活动。他在《民彝》的创刊号上（出版于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五日）发表了长篇政治论文《民彝与政治》，充分地表达了他对民主共和制度的礼赞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鞭笞。他所谓的“民彝”，就是人民的心理，人民的意志。他认为政治的好坏，就在于为政者能否适应和发扬人民的自由意志。他说：“兹世文明先进之国，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当代能够表达这种人民意志的政治，就是“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②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认为封建专制统治压抑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创造才能，是使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获得新生，就必须根绝专制制度。他说：“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

① 《大哀篇》，《李大钊选集》第三页。

② 《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第四十一页。

国民之公敌”。^①他以极大的义愤，强烈地表示了和专制制度誓不两立的坚定立场。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完蛋了。李大钊看到人民力量的胜利，感到十分鼓舞，并寄以莫大的期望，认为“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②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到北京先后参加了《晨钟报》和《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宪法公言》、《太平洋》等杂志上撰稿，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宪法与思想自由》等重要文章，继续鼓吹民主政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对专制压迫，反对思想统治，反对孔孟之道。他热情地号召和鼓舞青年：“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奋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③

但是，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局的发展是使李大钊失望的，不但没有什么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出现，而且是南北大小军阀更加激烈的争夺，随后又演出了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的丑剧，而段祺瑞则以讨平复辟、“再造共和”之名重新夺取了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段祺瑞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继续实行军阀专政和武力统一的反动政策。李大钊为此对中国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路在那里呢？李大钊提出了要创造一种新的“中心势力”的主张和设想。他说：“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④他分析了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的政治形势，认为原来活动在我国政治舞台上的三种势

① 《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第五十六页。

② 《“晨钟”之使命》，《李大钊选集》第六十二页。

③ 《“晨钟”之使命》，《李大钊选集》第五十八页。

④ 《中心势力创造论》，《甲寅》日刊，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力，都已不能成为国家的中心势力。第一种是掌握着军政权力的军阀势力，由于他们总是利用其所据有的权力为所欲为，背离了人民的意愿，所以“终难免于败亡”，在袁世凯死后，已“呈崩离之象”。第二种是以进步党（后演变为研究系）为代表的温和派，第三种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激进派。这两派都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一时，但都已日渐消沉。因此，这三种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所以，他主张我们应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别造一种中心势力以代之。此之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之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①

这个方案就是要以资产阶级为基础，又团结和依靠国民作后援，排斥军阀和投机政客，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力量，以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李大钊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而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这个方案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它却是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要求寻找新的出路的反映。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中国三种政治力量的分析，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情况。北洋军阀和研究系不用说，即以被称为激进派的国民党人，他也是失望的。如他于一九一七年在一封信中所说：“大抵今日之民党已失其正系，不偏于溺，则流于暴，求能平心静气，刚毅不挠，依据法律，以与强暴之势力为恒久之抵抗者，益无闻焉矣。”^②事实正是这样，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虽然坚

① 《中心势力创造论》，《甲寅》日刊，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② 《给李革庵的信》，转引自文操：《大钊同志五四以前革命活动的片断》，见《文汇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持了革命的立场，但不发动群众，主要是采取单纯的军事冒险活动，因而也脱离了群众，丧失了在群众中的影响。二是强调要“拥有国民之势力”，要国民自己觉醒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虽然这里所说的“国民”，仍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但是认识到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两年以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除三害》的社论中所提出的主张，可以说仍是这个方案的继续和延伸。陈所说的除三害，就是指军阀、官僚、政客。陈所说的：“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①也就是李大钊所要创造的中心势力。

但是，这时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是把建立真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却决定了它无力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正因为这样，他们当时都提不出如何实现这个方案的办法。李大钊曾经赞同对立的两方面势力互相调和，规劝他所说的温和派和激进派都自己“反省悔悟”，共谋出路；他曾经大力倡导发展国民教育，培植民力，养宿民德，他说：“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民力”，“民力既厚，权自归焉”；^②他还特别寄希望于青年的自觉，号召青年奋发图强，再造中华。在国内外反动派的统治下，这些办法显然都是不能实现的。但是，李大钊仍然坚信民主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潮流，是必然要胜利的。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曾经给了他以很大的鼓舞，连续著文欢呼，并强调它对中国民主政治前途的影响。他说：“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治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

^① 陈独秀：《除三害》，《每周评论》第五号，一九一九年一月。

^② 《论民权之旁落》，《言治》月刊第三期，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

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制之不可复兴。……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① 表示了他对于民主制度必胜的信念。

要求思想解放，主张科学真理，反对思想统治，反对偶像崇拜，是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也是李大钊的急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民主和科学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愚昧落后的斗争中而发展的。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没有民主，科学难以进步；没有科学的进步，民主也没有保障。我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专制和愚昧，也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封建专制制度（包括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造成了我国的愚昧和落后，而愚昧落后、迷信盲从又维护和巩固了封建专制。李大钊在分析我国封建制度长期统治的原因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我国自秦朝建立封建专制制度以后，“汉兴，更承其绪，专崇儒术，定于一尊。为利一姓之私，不恤举一群智勇辩力之渊源，嘶丧于无形。由是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嬴秦之政也。学以造乡愿，政以宿大盗，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且不堪也。”^② 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统治思想——孔孟之道的最大危害，就是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挫伤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使人人匍匐拜倒于往圣前贤的纲常名教之前，而变成封建统治者驯服的奴隶。因此，要建立和巩固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须使人民从孔孟之道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证人民的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李大钊为此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① 《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李大钊选集》第八十二页。

② 《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第四十四页。

在袁世凯推行帝制运动的时候，曾经出现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袁死后，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已堕落为保皇党徒的康有为，又公开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另外宪法草案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李大钊坚决反对这些谬论，他写了《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吾国自秦以降，其为吾人自由之敌者，惟皇帝与圣人而已”，“圣人之权威于中国最大者，厥为孔子”，^①皇帝与宪法不相容，孔子与宪法也同样不能相容。他说，“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同上）如果将孔教列入宪法，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思想、言论、信仰、出版等自由，“其祸视以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因为其为害不仅及于个人和一时，“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流毒所届，将普遍于社会，流传于百世”。李大钊还进而指出：尊孔复古是为复活专制作舆论准备。因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身符”，^②将此护身符列入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此乡愿政治之见端也。”（同上）

要彻底“打倒孔家店”，清除孔孟之道的流毒，还必须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宣传科学真理。李大钊指出：孔子本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但是由于其学说“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身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也。……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

① 《宪法与思想自由》，见《宪法公言》第七册，一九一六年十二月。

② 《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第七十七页。

灵魂也。”^① 在这里，李大钊还进一步对孔子作了历史主义的分析。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同上）因而也有其历史的价值。但是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他们统治的利益，利用孔子的学说并加以塑造，而将其偶像化，以作为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则是另一个问题。对于这种神化了的孔子的偶像，必须推倒，为此“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同上）

以上李大钊对孔子的分析，不仅表现了他反对偶像崇拜的极大勇气和坚定态度，而且表现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孔子作了历史的分析，把历史上的孔子和后来被神化、偶像化的孔子加以区别。这就在批判孔孟之道的同时，又给孔子以恰当的评价，避免了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对孔子、对中国文化否定一切的错误偏向。同时李大钊的分析把专制君主和孔孟之徒密切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大盗和乡愿（和别人同流合污而又伪装清白的孔孟之徒或士人）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这就把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和反对军阀专政、帝制复辟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了，对于推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向现实的反军阀的政治斗争发展，也是有作用的。因为早期的《新青年》曾经声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②

李大钊在批判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时，还进一步指出，必须打倒一切偶像崇拜，树立真理的权威。他说：“偶像云者，即先入为主之偏见妄想也。”^③ 它和科学真理是不能并立的。他号召青

①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选集》第八十页。

② 陈独秀：《通信》，《青年》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一五年九月。

③ 《倍根之偶像说》，《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①他强烈地喊出了“真理之权威”的呼声，号召人们宁崇拜真理，崇拜科学，而不应崇拜孔子，崇拜偶像。他还认为：真理是宇宙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的正确反映，它是从客观宇宙来的，“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②

这时李大钊当然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来对真理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但他的朴素的唯物论观点是很清楚的。根据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从客观实际出发去寻求真理，强调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把追求真理看成是“人生最高之理想”。^③他特别强调要有敢于坚持真理和为真理而牺牲的勇气，不要因为社会上有非议而背弃真理。

早期的李大钊不仅是一个反对专制和迷信的英勇战士，也是一个反帝爱国的英勇战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李大钊的急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的方面。

从鸦片战争中国的门户被打开以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向中国涌来，向这个长期停滞和落后的老大帝国开刀，把中国逐步地变成了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和奴役下的半殖民地，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和痛苦。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和反封建的斗争一样，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成为每一个中国的先进分子最迫切的要求。

李大钊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民族危机达于极点的时候。

① 《青春》，《李大钊选集》第七十五页。

②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选集》第七十九页。

③ 《真理之权威》，《李大钊选集》第八十七页。